

关于郭沫若的自我批判

武 继平

1. 引子

1966年文革爆发一个月前，中国文学艺术界最高领袖郭沫若“触及灵魂的”自我批判通过《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两大媒体传向全世界，给关注新中国成长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冲击。然而，即便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在整个中国媒体依然严重缺乏自由言论空气的情况下，《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实际上充当的只是执政党的传话筒。由于诸多原因，人们一直无法知道当年郭沫若进行全面自我否定的史实真相。

九〇年代以后，中国言论自由方面的制约开始逐步得到缓解。本文将根据那以后出版刊行的共产党党史资料，对1966年郭沫若自我批判的史实进行详细考察。至于如何看待郭的自我批判的问题，尽管非常重要，但由于不在本文考察范围之内，故在此回避不提。

2. 先行研究及有关资料

郭沫若的自我批判自文革以后，即便在八〇年代颇为盛行的“郭学研究”热潮中也是一个被回避的敏感话题。九〇年代以后，在“反思文革”和“重建文学史”思潮中虽然多少有所被言及，但遗憾的是人们关注的并非史实真相而是对包括郭沫若在内的极端个人崇拜制造者的道德清算。在这个过程中，与郭沫若划清界限以及对郭人格的唾弃成了一种时髦。

然而九〇年代以后，66年《光明日报》主编、最早的文革小组成员穆欣，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宣部副部长龚育之这样一批既经历过文革并熟知文革初期共产党上层内情的当事人退休后开始通过回忆录披露出大量长年不为人知的史实，为研究者提供了一批难能可贵的资料。然而遗憾的是，随着新资料出现的是对毛泽东的批判，而不见对郭沫若问题的重新评估。在日本情况更糟。66年郭的自我批判发表以前，郭沫若可以说是最受关注的研究对象之一。对郭沫若的翻译研究自二〇年代开始，研究者们的热心程度仅次于研究鲁迅。然而郭的自我批判发表后情况发生了巨变。文革初期还出现过如何看待郭沫若自我批判的讨论，但67年以后，整个研究界似乎忘却了郭沫若这个人物的存在。

3. 关于郭沫若的自我批判

3-1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的即席发言以及国内外的反响

1966年4月14日，郭在人大常委会第三〇次会议上即席作了自我批评。4月28日《光明日报》和5月5日《人民日报》先后全文刊载了该发言。郭的发言中有以下两处内容使国内外震惊。

- ①. 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 ②. 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夸夸其谈的什么哲学家、史学家、什么家，简直不成家。工人、农民比我们学得好得多。

郭文发表后即刻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朝日新闻A F P特派员满是误译的报道引出了著名文艺评论家福田恒存言辞激烈的非难文章。福田严厉指责“中国的恐怖政治”，并视郭的自我批判为“知识分子的道德堕落”。《朝日新闻》还专门发表社论，在对中国举国上下自我批判成风的现象表示难以理解的同时，号召人们密切关注中国的政治发展。著名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家须田禎一撰文对“知识分子应该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表示理解，但对郭的“烧书”言论抱有疑问。翌年2月川端康成、石川淳、安部公房、三島由紀夫认为毛泽东推行的政治对知识分子进行

了“迫害”，四人联名发表声明，以表示对文革的抗议。

3-2 郭沫若的反论

面对来自国外的严厉谴责，中国于1966年7月在北京主办召开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郭沫若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的身分在会上公开反击。他谴责这种来自国外的非难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大规模反华浪潮”。针对日本的批评家哀叹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思想自由，驳斥这种“自由”不外乎是“造谣诬蔑百分之百的自由，是自己暴露愚昧无知的百分之百的自由，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百分之百的自由”。《朝日新闻》以「郭沫若的反论——致福田恒存氏」为题报道了郭的发言。

至于郭是否做过针对三島由紀夫等联合抗议声明的反论，中华全国文联及中国作家协会方面的资料尚有待发现。

3-3 自我批判以后郭沫若地位的变化

66年4月的郭沫若身兼4项政府要职（党内没有任职）。1）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中国科学院院长。3）全国文联主席。4）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五〇年代前半期作为中国的世界和平使者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66年“五·一

六”通知下达以后，科学院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院长之职被架空。科学院的决定权由郭沫若移交给毛泽东的心腹陈伯达。66年4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发表后，全国文艺界的最高领导权落到江青手里，文联主席变成空职。按照郭本人的说法，那以后他只是“人大外宾接待员”而已。

4. 自我批判的政治背景

4-1 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反右斗争以后知识分子不再是保护对象

建国初期、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对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并加以吸收。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的讲话成为共产党知识分子新政策的基调。然而，57年反右斗争以后，来自旧“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开始受到严酷的迫害。这种迫害直至文革不断升级。

4-2 思想改造——政治运动的洗脑造成价值及是非判断能力的丧失

尽管郭沫若一贯以积极的姿态投身于建国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然而每次运动初期他的见解几乎都与毛泽东的意旨相背，并因而陷入窘境。51年的《武训传》批判、57年反右派斗争（初期）、65年末开始的吴晗批判等等，郭沫若都由于自己对被批判者表示过同情而差点下不来台。每次政治运动中几乎都被迫否定自己的观

点。

4-3 参政意识的丧失——辞呈的递交

57年反右斗争开始的新“文字狱”不断扩大升级，郭沫若自觉无力紧跟毛“继续革命”，1966年1月27日正式通过科学院党组向党中央提出辞呈。

应该把郭沫若辞职的行为视为对毛政治的拒绝合作。这无疑是不愿彻底放弃追求精神自由的知识分子良知的体现。也可视为一贯积极参政的郭沫若对当时政治体制的怀疑。

1982年第4期《新文学史料》载陈明远回忆文章首次披露这封辞呈的存在。原中宣部副部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于新刊回忆录《在漩涡的边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9）中证实了郭的辞呈曾被彭真作为《二月提纲》的附件交毛泽东过目的史实。在这之前一直被视为捏造。

4-4 郭沫若即席自我批判发言的直接诱因——《二月提纲》及毛泽东指示

根据龚育之在《在漩涡的边缘》中的回忆，郭的辞呈当时经中宣部科学处（直接领导科学院党组）处长于光远之手转交“文革五人小组”组长彭真。随后整理成向毛泽东汇报的《二月提纲》七个附件之一上呈毛过目。彭的目的在于提醒毛，像

郭老这样忠诚的知识分子都打退堂鼓了，是不是批判“资产阶级指示权威”的斗争搞得太过火了。殊不知触及毛逆鳞。毛指示，郭沫若和范文澜二人保是可以保，但必须作自我批判！结果郭的辞职申请被驳回。毛的指示即刻由“文革五人小组”通过科学院党组直接向郭沫若本人传达。

4-5 导致自我批判的决定性因素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及毛泽东指示的党内转达（4月10日）：

“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五·一六”通知）

“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社论。初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五·一六”通知正式下达之前，上述毛指示已被贯彻落实。吴晗、邓拓、廖沫沙、翦伯赞、田汉、夏衍等先后在《人民日报》上被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反

动学术权威的代表加以点名批判。随后或被革职、或被隔离审查、或被送进监狱。

三〇年代以后的文艺遭到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彻底否定。郭沫若意识到自己再固执下去不检讨，自己的问题将由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辞职申请被驳回导致最后的堡垒——沉默的失守。

4-6 递交辞呈和自我批判的其他诱因

1、65年12月在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同时，北京大学校内の“大批判”大字报区开设了“郭沫若批判”专栏。郭的历史剧等受到点名批判。

2、同一时期中央统战部内部刊物『零讯』及『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刊载批判郭历史剧《武则天》和《蔡文姬》的大块批判文章。

5. 关于郭沫若自我批判公开发表的史实

自我批判后数日，郭对科学院党组领导称“短期休养”，遂携妻及秘书回四川。据当时任第一秘书的王廷芳回忆，离开北京前，在上海得知郭在人大作了自我批判的康生向全国人大副秘书长连贯索要郭的即席发言稿。连贯赶紧将发言纪录亲自送郭过目。拿到郭盖有印章的发言稿后并未说明是由于康生索要。

康生拿到郭稿后即刻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审阅。并经毛的同意后交《光明日报》发表（根据《光明日报》总编穆欣及郭秘书王廷芳的回忆）。当时《人民日报》社长邓拓正在接受隔离批判（两周后自杀身亡）。总编吴冷西是“文革起草小组”成员之一，即遵毛旨意于一周后（5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了郭的自我批判文章。

郭本人自4月20日前后离开北京。28日在四川省渡口市看到当天《光明日报》刊载了自己的人大发言。受到的精神打击可想而知。然而，郭无意回京，继续朝家乡乐山方向漫游。在成都五一劳动节庆祝大会上接到中央将于5月4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紧急电话通知。在党内没有一官半职的郭沫若被指名作为列席人员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完全不知道会议召开的第二天自己的自我批判文章竟会在最大的党报《人民日报》上刊出。（根据王廷芳《周总理和郭老的友谊》，上海《文汇报》1986年1月8日；穆欣《郭沫若在“文革”中的劫难》，《炎黄春秋》1998年第7期；阚民《“文革”中的郭沫若》，《党史博览》2000年第10期）

6. 结束语

66年5月4日、郭沫若列席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该会议诞生出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在会上郭得知毛泽东号召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夺权的最新指

示。尽管他的自我批判文章的公开发表并非出于本人意愿，但结果按毛的意旨被划为接受保护的一类而免被定为肃清的对象。

毛泽东的本意在于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当初建立联合政府也只是希望得到知识界的合作。然而知识分子们希望的是民主协商治国。为了使得知识界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毛泽东施铁腕给知识界出示了两类知识分子的遭遇：一类是像吴晗，邓拓，翦伯赞这样的不愿一切服从共产党领导的“反面教员”。他们的下场是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受到肃清。结果是身败名裂。另一类像郭沫若这样改造成功的知识分子。名声地位都可以保住，只要听党的话。